

关于文学遗产的 批判继承问题

胡 念 贻

岳 麓 书 社

12304/12

关于文学遗产的 批判继承问题

胡念贻

文学

胡

岳麓书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76689

976689

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胡念贻 著

责任编辑：杨 坚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1980年第1版 1984年6月第2版第1次印刷
字数：250,000 印张：10.125 印数：1—5,000

统一书号：11285·25 定价：1.75元

17304/12

代序——悼胡念贻同志

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杰出研究员胡念贻同志因肺癌不治去世。半年以后，念贻同志的夫人送来他的遗著《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一册和《论宫体诗的问题》等单篇论文四篇，拟在再版增订时一并收入上述论遗产继承问题一书中，问我的意见。我当然赞成把他的作品尽量收集印行。我还记得《论宫体诗的问题》在一九六四年发表于《新建设》以后，曾引起一些争论。后来念贻同志又发表几篇有关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的论文，在今日看来，这些文章所要维持的观点无非是要：1.不违背常识以迁就极“左”思潮。2.不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3.继承中国文学遗产中可取的部分，用批判而不是用粗暴的、一笔抹杀的态度对待文学遗产。这些理论都是平实可行、无可厚非的。但在当时已经冒头的极“左”思想控制之下，批评家以越“左”越好的“正确”观点作为标尺，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表示自己的“正确”而挖掘别人的错误。在有几次座谈会中，参与的同志们，连从来没有看过念贻文章的人，或根本不理解“宫体诗”的朋友，都侃侃而谈，众口一词地大批念贻的“错误”观点，念贻素性木讷，不善于辞令，不善于陈述自己的论点，不善于表现“左”倾，在那一次又一次的一面倒的座谈会中，他既不会“舌战群儒”，又不愿意否定他所相信正确的论点，其苦恼与狼狈情形是不难想见的。

念贻在他的同辈的研究工作者之中是比较有旧学基础的。在抗日战争时期，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迁避安化七星街，他在第一中学是高材生。他曾和同学王俨思、唐稚松、聂铁珊四人合印过一本旧诗集——《湘涟诗词选》。此集虽已失去，但他后来陆续写的旧体诗词尚有二三百首，现在他的同学、湖南教育学院的王俨思同志正在整理。他在就学时期发表的论文多用文言写成。念贻是个勤奋的人，先后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学术论文，并且已经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论丛》、《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先秦文学论集》等论文集，其它未发表者尚有二十多万字。

念贻治学的兴趣也比较广泛，不象有些学者“专精”一门，不及其它。他在原中央大学（1945—1949，现南京大学前身）就学时，我也有一段时间正在该校任教。我在国文系开“文字学”、“古代文法”等高年级课程，他也来听课。他在中学的老师刘家传先生原是我在中山大学的学生，也跟我学过这些课，他大概听刘老师讲起过，所以到中央大学后也来听我的课。我讲文字学是用甲骨文、钟鼎文、《说文解字》贯穿了一起讲的。现在听起来这样讲法毫不新奇，也许原该如此，但在当时是颇受某些“老”先生的仇视乃至背后批评的。他们自称是“章太炎的弟子”，不屑称甲骨文，叫它“乌龟壳子”，有人则公然著书立说，要“理”甲骨文字之“惑”。所以在这种气氛中来听这些课，也得有些勇气。

念贻的刻苦耐劳是可惊的，他在中学毕业后到重庆考大学是徒步走去的，路上还遇见土匪，把路费抢光，当地农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同情，自动凑了一点钱给他们，他们才得以走到重庆。从这一简单的经历中，也可以看出国民党统治之腐败与内地农民之善良（这是现在许多青年所不知道的）。念贻一九四九年南京

大学毕业后，考入北大为研究生，一九五三年参加文学研究所工作，就我见闻所及，他又是文学所古代文学组研究工作人员中最勤奋的一人。文学研究所并没有为研究人员预备研究工作室，我们年长的大都在家中工作，事多时不分昼夜，也无所谓“上班”。但中青年研究人员则家中既偏窄不堪，所中又无立锥之地——只有一间办公兼会议室，开会时挤进二、三十人，从窗台上坐到办公桌上。我发现在“无会期”内念贻总在办公室内看书写作，我常笑他是古代文学组的“常务委员”，否则他便到北京图书馆或科学院图书馆去了。

念贻学术兴趣之广，可以从他的工作看出来，除了上面已说到的著作之外，他已编好一部《楚辞选注》。楚人选楚辞，自然最合适。另外，他还有志编《全宋诗》，已经收集了不少材料。这一工作，也许是我激发他做的，因为前几年姜椿芳同志开始规划编著《大百科全书》时，他让我负责宋词这一部分的编写工作，但宋代的词人又大都同时是诗人和文人，搞词人非同时搞诗人和文人不可。我因别的事太忙，就推荐念贻来担任这一宋代文学的编辑工作。这么一来，我在他已经衰弱不堪、工作繁重的肩膀上加上了又一重担，不啻又逼他看许多宋人的集子，引起了他的雄心壮志，如果因为我不知道他已有病而竟逼他做“蒋筑英式”的烈士，这是我将抱憾终生的！当然，湖南青年那种“硬是发狠”的干劲，我是因为教过一些湖南学生而深有所知的。象念贻这样的人，即使没有人交给他新的任务，他也会孳孳不倦地、无休止地干下去的。

念贻虽然平日沉默寡言，甚至讷讷不能道一语，但他生经“四人帮”猖獗的动乱时代，自有他坚定的看法，独特的作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先贴出一张“自我批评”的大字报，殆即古

人所谓“自刎”罢，然后他在“牛棚”的外舍安下桌子，每天上午坐着看《毛选》，这就使对他跃跃欲动的“造反派”失去了攻他的锐气。在“十年浩劫”的后期（1974年），“四人帮”特别活跃，在西苑大旅社包下楼房，为“名”演员录音录像，约文学所的同志去编写“说明”，念贻没有去。但到一九七六年周总理去世后的“四·五”清明节，群众为纪念总理而去献花致哀时，念贻写了两首《西江月》的悼词，写在白绸子上送到天安门前，“四人帮”痛恨文学研究所有此哀词，追究作者，念贻几乎遭其毒手。在这种情形之下，他的观点和立场是清楚而坚定的。

念贻得病在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旬广州开会期间。其实，他在动身去广州之前已感到不适，不能吃饭。他也是象蒋筑英那样力疾从公的。十二月在广州病重回京，在同仁医院检查两次，第一次检查竟说没有病，第二次检查才发现右肺有球形阴影，并已扩散至左肺。如此重病，医院竟不收，后来千恳万求，在广安门医院弄到一个床位，治疗无效，只好接回“家”来疗养。念贻终于一九八二年八月一日病卒，年五十八岁。他如果能早一点发现病情，早一点认真治疗，减轻些工作，少一点劳累，不去参加广州会议，病了少一点折腾，可能不至于过早去世。念贻不声不响地去世了，没有像蒋筑英那样得到公众赞扬，其实在他短短的一生中能作出上述的研究成果，他平时从不休止的工作，以及带病赴会，种种“发狠”图强的精神，即使说他是蒋筑英式的科学战士，也不为过。

念贻所遗留下来的工作，除《全宋诗》将由他生前的合作者劳洪同志负责完成外，在未整理完他的全部遗稿之前，先将这一册增订再版。所增订的是《论宫体诗的问题》、《谈谈我国古代作

家作品评价的一些问题》，以及四篇评论性的文字：《评晏子春秋集释》、《诗经通论简评》、《读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古籍和古典文学选本的“前言”、“后记”》，以及谈一九六二年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总结性文章，这四篇性质略异，但也同属于我国古典经籍的讨论，不妨作为研究文学遗产的附录文字。

关于这个集子所收每篇文章的内容，作者在“序”言中已有简略的说明，我不必辞费了。此集既然是讨论我国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只要“遗产”本身存在，继承问题也就永远存在。处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古典文学遗产已经不是中国一国的文学遗产，而是整个人类文化遗产的一部份。说得再具体一点，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已经不是我国课堂中的教材，而是香港、澳洲、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上千万华侨子弟的读物，也是许多中学生学习的材料，语文的范本，欣赏的瑰宝，外国许多大学中博士论文的研究资料。即使我们不幸再出一些“四人帮”式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或自卑疙瘩的“维克点”（victim）可怜虫，我们的文学遗产在今日也早已遍布世界。中国的古人说：“礼失而求诸野。”古人所谓“礼”是指社会制度，今日应该理解“礼”是整个人类的文明。中国的文明的种子早已遍播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批判继承”。念贻的文章中充满着为要保存文学遗产中的精华部份而苦口婆心地强调“批判继承”，也可以看出他生怕别人倒脏水连浴盆中的婴儿也倒掉。我想他如果知道祖国文化的总和的威力远远超过一些“左”派仁兄的貌似进步的魔力，他是可以瞑目于九泉了！

吴世昌序于北京东城之罗音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目 录

代序——悼胡念贻同志……………吴世昌（1）

序……………（1）

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5）

再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26）

谈谈我国古代作家作品评价的一些问题……………（51）

论宫体诗的问题……………（64）

试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79）

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

——三十年来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103）

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

——读《诗词若干首》所得的启示……………（148）

应当批判地对待古典文艺理论批评遗产……………（162）

不要把古人的思想现代化……………（174）

论赋、比、兴……………（178）

论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201）

古代散文研究的两个问题……………（213）

文学史编写中的散文问题·····	(219)
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句·····	(237)
驳所谓“儒法斗争是贯串中国文学史的主线”论·····	(253)
评《晏子春秋集释》·····	(272)
《诗经通论》简评·····	(277)
略述一九六二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	(280)
读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古籍和古典文学选本的“前言”、 “后记”·····	(295)

序

收入这本书里的十三篇文章，有七篇是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的；另外的六篇，谈的是有关古典文学研究的综合性问题，它和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也有些关系，因此就合编在一起了。

作为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对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自然要关心。从事一种工作，总想明白干这种工作的意义和目的。研究古代的文学，总想了解它对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究竟有什么作用，以及如何才能发挥它的作用等。怎样对待文学遗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早有过许多论述，在理论上应当已经解决了，然而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似乎并没有解决。例如，继承什么，怎样批判。在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中间，认识是不一致的。解放以后的二十余年间，人们的观点，常常依政治斗争的形势为转移，有时似乎没有什么客观的标准。

一九六二年，是我们国家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国民经济八字方针的第二年；党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思想文化领域内正在纠正五十年代末以来的一些“左”的偏向。在这种形势下，我写了《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一文，发表在《新建设》，谈了我对五十年代末以来对待古代文学遗产的简单粗暴倾向的一些意见。半年以后，政治思想战线发生变化，开始强调阶级斗争，我那篇文章

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就迅速地被引起注意和成为批判的对象了。当时我那篇文章是有缺点的：有些问题考虑还不成熟；在批评简单粗暴倾向时缺乏深入的分析，因此说理也有些简单。一九六三年，我写了《再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作了一些自我批评和对自己的一些论点作了某些补充说明。一九六四年，我又写了《论宫体诗的问题》，说明我对宫体诗所持的基本否定态度，同时认为作为一种文学历史现象，应当对它作全面的分析和评价。这两篇文章发表后，引起越来越多的批评，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六五年冬和一九六六年春，我又写了《试论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比较全面地论述我的观点，希望发表出来，让批评我的同志对我的观点有更多的了解。但是这篇文章打印一次之后，一直没有发表。

当时一些同志批评我，主要是说我对于遗产反对批判继承，主张精华和糟粕兼收并蓄；说我在评价古代作品问题上反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按照这些责难，我的文章当时已经超出一般的学术问题，而是直接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挂上钩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容许争辩的。当时我自忖没有这样一些观点，我的文章都反复强调要批判，强调要政治标准第一，写得明明白白，而批评的文章却一篇接一篇是那样说，我感到有些纳闷。

今天回头去看十几年前的事，可以看得清楚了。当时在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内有一种“宁‘左’勿右”的风气，我的两篇谈批判继承遗产问题的文章刚好遇上这个时候。我那两篇文章贯串一个论点，就是强调对于古代文学遗产要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或者说，要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都是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说过的，我不过是结合当时的古典文学研究现状来谈一些意见而已。当时我感到一些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说的“剔除

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理解有些狭隘。我在《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里说了这样几句：“‘民主性’和‘封建性’是属于政治范畴的概念。对于古代作品，我们还可以从艺术性的角度去衡量。”对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我觉得有些同志的理解也片面。这些看法，我在写文章时再三考虑，没有充分谈。应当说，我的文章一方面是用心不细，一方面又是过于小心的。

去年，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解除顾虑，写了《研究古典文学与批判继承遗产》和《要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两篇文章把《谈谈》、《再谈》和《试论》三篇文章里所想谈而没有谈的一些观点都谈出来了。

我这里还要强调：一、对于文学遗产，必须坚持批判，只有经过批判才能继承。批判就是对古代作品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分析的结果，当然要有所扬弃，有所肯定。分析得好，分析得合乎科学，就能使人获得益处，也就是较好地完成了自己所负担的批判任务。二、对于评价古代作品，必须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这就是对于根本反动和腐朽堕落的东西必须排斥，对于能够接受的作品，不能没有区分，必须结合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来作出评价，而思想内容是首先考虑的因素，对艺术性也必须充分重视，作认真的研究。这两点，我过去坚持，今天和今后仍然坚持。这些意思，我在前后几篇文章中都反复强调过。这是不能动摇的。

我诚恳地感谢一些批评过我的同志，因为他们促使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来思考批判继承的问题，促使我改正自己文章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次付印前，我对《谈谈》和《再谈》作了一些修改，修改当中是参考了他们的一些批评意见的。关于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本来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需要作长期的深入讨论。

写作中难免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就非常需要同志式的批评。

本书收入的《应当批判地对待古典文艺理论遗产》和《不要把古人的思想现代化》两文作于一九六三年。那是在读了某些同志的古典文学论文之后，觉得其中一些对古代作品的论述不尽恰当，就提出了一些粗浅的批评意见。我认为那些不恰当之处是对于古代某些作家的思想作了偏高或过高的评价，以至不符合它的本来面目。有的同志拔高古人思想，也许是为了把古人说得和今人更接近一些，出发点也许是为了想作到古为今用。然而这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这些问题，应当归到批判继承问题所讨论的范围。我的一些粗浅意见如果和原作有不符之处，希望原作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出。

此外还有几篇文章。《论赋、比、兴》和《论山水诗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参加赋、比、兴问题和山水诗问题的讨论中写出的；这两个问题的讨论还有待于继续深入，这两篇文章也许在今后的讨论中还可供翻检。如何处理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的散文，这是文学史编写工作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关于古代散文的两篇文章，是想就这个问题作一些探讨。第二篇本来是为准备参加一个文学史讨论会而写的，后来讨论会没有开，文章也过了十余年才发表。炼字炼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诗歌创作的艺术传统，《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句》一文在这个问题上搜集了一点资料，苦于谈得不深。《驳所谓“儒法斗争是贯串中国文学史的主线”论》，是批判“四人帮”的一个谬论。这六篇文章，都是对文学史上某些问题的综合论述，涉及面比较广，错误在所难免。

最后，我诚恳地欢迎读者对这本书提出批评。在批评中可以使我改正错误，获得提高，对今后的工作会带来益处。

胡念貽

一九八〇年三月三十一日

谈谈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问题

一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继承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不止一次地作过很重要的指示。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到我国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教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说“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①。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②这些是说的古代文化，也包括古代文学。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里，从现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和批评出发，也谈到了对古代文学艺术遗产的继承问题。这篇著作指出我们继承遗产的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同时也指出必须采取批判的态度。它从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事业的角度出发，特别指出了批判地继承遗产的重要：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701页。

“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①

这里接下去反对了那种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这段话指出继承和借鉴对文学艺术的创作是有重大的作用的。我们的文学艺术创作要“文”、要“细”、要“高”、要“快”，就不能不借鉴。在作家和艺术家创作方向的根本问题解决以后，对于他们的创作不能不要求“文、细、高、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借鉴问题对于文学艺术作品的质量和数量的提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不但指出了批判地继承的重要，而且还教导我们怎样去批判。批判地继承文学艺术遗产，也同对于其他文化遗产一样，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文艺有它的特点，它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现实，它离不开政治，又能够反过来给予政治以伟大的影响。在评价文艺作品时，既有政治标准，又有艺术标准。毛泽东同志指出应该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他接着说：

“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6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71页。

这是评价古代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总的原则，是“吸收民主性精华，剔除封建性糟粕”这一原则在评价古代文学艺术作品时的具体运用。

解放以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经过了不断的学习并实践，取得了很大成绩。它表现在打破了许多传统之见，批判和否定了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也肯定了一些民主性的精华。许多议论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段话，在许多研究论著中经常被引用，许多研究者都企图根据这个原则来对古代作家和作品重新评价。随着工作的开展，许多人对于“吸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这一指示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认识到了在一个作家的不同作品中或在一部作品里由于作家世界观的复杂，常常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有许多作品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思想，但随着时代的推移，那种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已经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而成为落后甚至反动的了。许多人看到了这些情况，认识到了批判地继承遗产，是一项复杂的工作；而且在将古典文学作品推广到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时，不能不作一番细致的分析，教读者懂得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最近几年来古典文学研究工作的发展很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也进一步缩小。尤其重要的是使得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和当前的伟大运动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更加有了密切的联系；一些研究工作者常常考虑到古为今用，考虑到如何将古典文学送到人民大众的手里而不发生消极的影响。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十多年来亲身的体验，深刻地领会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对于